

贺圣谟 著

杭州大学 出版社

论湖阴诗社



论湖畔诗社

贺圣谟 著

论湖畔诗社

贺圣谟 著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75 印张 22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书号:ISBN 7-81035-513-9/I·051

定价:20.00 元

## 序

骆寒超

还是在十多年前，我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读到圣漠对汪静之的两本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作比较研究的论文，虽然我同汪老自己的看法一样，有点偏爱《寂寞的国》，对圣漠的某些看法持保留态度，但他提出《寂寞的国》总不及《蕙的风》社会反响大，并能以社会审美理想的变异为依据，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我还是很欣赏的，并在记忆里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现代诗学缺乏专门研究者的中国，能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我自然十分高兴；更何况，我和圣漠又都在浙江。所以这以后，我们就联系上了，加之不久我们都成了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开会常在一起，也就更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关系。

我还记得读上面那篇文章时，就隐隐约约感到圣漠很重视资料积累，给人言必有据的感觉。有一年，我应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之邀，前去讲学。圣漠除了以系主任的身份陪我开展讲学活动以外，还邀我到他家去叙旧。他的家在宁波市中心一条巷子的口头，是座石库门房子，看得出当年这里是很显赫过一阵子的。他住在二楼，有好几个房间。除了敞亮朴实的卧室兼书房，其它

几个房间全是一排排书架，堆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俨然是一个专业图书馆。我陡然有一种进入宝山的幻觉，乐不可支。圣漠确是个“书痴”，他收集了不少现代文学初版本书籍，特别是诗集类更是丰富，我久访不得的诗集，如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等，也赫然在架上，忍不住发出了惊叹。圣漠十分豪爽，连声说：“要看吗？拿去！”我也就不客气挑了一大堆——它们使我的一本新著《新诗新潮论》因此而丰富了不少。我还发现圣漠处湖畔诗社的资料十分齐全，就激励他写一本研究“湖畔”诗社的书出来，趁汪静之还健在，也好请他老人家作一番订正，以保存更多的历史真实。圣漠被我说动了，说：“试试看！”

这一试，就试出了这本《论湖畔诗社》。

76年前，四个年轻人——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湖畔诗社，他们以“放情地唱”的姿态，“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出版了“湖畔诗社丛书”：《湖畔》（四人合集）。尔后《蕙的风》（汪静之个人诗集）、《春的歌集》（三人合集）、《苜蓿花》（谢旦如个人诗集），陆续出版；并且，还因为汪静之一首小诗《过伊家门外》，引起遗老遗少们“含泪的”酷评，具有民主意识的年轻人很是反感，也激怒了新文坛的领袖人物鲁迅、周作人等。大家一起上阵，和胡梦华等“含泪的批评家”展开了一场有关人性解放的大论战。这个“放情地唱”出那一代青年人性觉醒之情的诗社，无异于向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投掷了一串“集束手榴弹”，而这四个热血青年中的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在“湖畔”歌笑、歌哭了一阵子后，也就勇敢地投入时代的大潮，参加了革命，并以生命写下了最壮丽的诗篇，纷纷倒在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坎坷的道路上。至于汪静之，虽然一开始就打算在西子湖畔做隐士，没有参加实际

革命活动，却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写诗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人，走着正直的人生之路。所以我说：每一个研究中国新诗的人，要想绕过“湖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诗社当年所显示的“诗品”，其社会影响是抹煞不了的；四个诗人所显示的“人品”价值，更是可以彪炳后世的。

令人遗憾的是岁月的灰尘似乎有悄悄地掩埋起这个诗社的趋势。当然，由于他们的这些诗是“放情地唱”出来的，坦诚、率真、质直、自然，情感以绝对自然流泻的策略传达出来，免不了回味的余韵不足，又加之采用口语化的自由诗形式来写，免不了散漫无节制，后人看来确会有“诗质”不高之嫌。这可以理解。但这恰恰是冲击封建伪道学和旧诗僵化遗风所必须的。站在“史”的立场看，这些诗好也正好在所谓的“诗质”不高。因此，如何对“湖畔”诗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科学的价值定位，是不能不抓紧做的一项工作。

圣漠的新诗研究没有绕过“湖畔”，不仅敢于挑起这一付价值定位的担子，而且定位得既科学又有分寸，是很值得称道的。

这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湖畔诗社评述”，第二部分是“湖畔诗人分论”。我觉得两者的比例不够匀称。第一部分“评述”得虽扼要而中肯，但显得简略了一点。主体实际上是第二部分。这部分对几位湖畔诗人的论述颇呈异彩。

朱自清当年评“湖畔”诗人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并说：“潘漠华氏最是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这是从情诗写作的角度作的比较，不是没有道理。但圣漠却认为这几个诗人的创作不只是写写情诗而已，还写有更多社会人生的感怀之作。我觉得这立论站得更高，因此读罢这部

书，我们会感到圣漠比较他们在把握真实世界与表现真实世界的整体面貌上，自有一番新的评价。那就是：潘漠华在感受世情中有社会逆子的凄怆孤傲，冯雪峰在品味世情中有农家学子的质朴深邃，汪静之在反叛世情中有少年才子的放浪率真，应修人在表现世情中有江南游子的纤柔至诚。我以为圣漠这些判断显示出见解的新颖和学术思想的深沉。

在对每一位诗人的专论中，圣漠对汪静之最花功夫。对这位老寿星诗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诗歌品位的辨识上，这当然很好。只不过对《寂寞的国》似乎评得偏低了一点。我认为《寂寞的国》是中国新诗走向成熟中一个方面的标志。汪静之对新诗律化问题的思想比闻一多等要觉悟得早，实践得也要早，此功不可抹煞。应修人的诗，圣漠是分三个时期来评析的，很有见地，并且对这位诗人探求诗歌之路的复杂曲折性分析得很细，很有层次感，还研讨了应修人继承传统诗艺进行创作的得失，见解新颖。论潘漠华时，圣漠把这位诗人的个性、身世同创作的关系结合得很紧，通过他的论析，我们对潘漠华的诗——特别是有些“千古不解之谜”般的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圣漠对冯雪峰的个性与智性抒情关系所作的剖析也很有见地，特别对冯雪峰诗才的“潜能”方面，估价得恰如其分，只是对其中有些诗，如《这深山中只她一个人》、《日影已在山岗飞去了》的理解上，似乎对这位诗人的本体象征意蕴挖掘不够。作为商榷，谨提供圣漠参考。这本书把谢旦如列入“湖畔”之列——因为他的诗集《苜蓿花》作为“湖畔”诗社丛书之四出版，这是新的提法，以史实说话，该是对的。对《苜蓿花》的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示了“湖畔”将会出现一种从人性抒情透现出社会抒情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位诗人好像是作了一份“尾声”的工作，既显示出“史”的真实，也显示出理

论逻辑体系的完整。

这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对“湖畔”诗社和这几个诗人在新诗史上作价值定位，是放在整个新诗大背景上来进行的。圣谟花了较多篇幅拿诗派与诗派、诗人与诗人作比较，使这一场对“湖畔”的价值定位很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比较是越系统越全面越好——但这又可能是过高的要求了，因为一本书所能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

“湖畔”这四位诗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或新诗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值得后人永远追思。可惜他们个人的结局都不那么美好。潘漠华与应修人是在与敌人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冯雪峰参加了长征，又被关入上饶集中营，几乎被折磨至死。这样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却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一直都不不得志，终于在大夜弥天的1976年初默默地告别了人间。当年反右时作了“爆炸性发言”、欲置冯雪峰于绝境的一个老作家，口口声声说“懒寻旧梦”，但对冯雪峰却例外，直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还在指责这位早就离开人间的诗人。对这种变相的鞭尸行为，冯雪峰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汪静之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虽是终老湖畔，也是孤孤单单，蛰居在我家前面不远处一幢公寓的底层。据说有一年夏天他得了肠胃病，急送医院治疗，但这位当年已近90高龄的老诗人是在过道上搭了铺算作“住院”治疗，想起来叫人心酸。但汪老对此始终抱无所谓的态度。我去看他，他总是笑咪咪的，同我谈他的“六美缘”，还信心百倍地说他要活到一百岁。可惜他也于两年前告别了与他终生相伴的西子湖，以及他热爱的人间。

汪静之的世界永远是西子湖边的青春梦，但“湖畔”诗社的青春梦这位老寿星是不可能永远牵住的。那末靠谁牵得住呢？



我想：圣漠这部《论湖畔诗社》，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

1998年6月25日写于  
西子湖畔乌石山下

## 目 录

序.....	骆寒超(1)
小引.....	(1)
湖畔诗社评述.....	(8)
湖畔诗人分论	
汪静之 .....	(14)
应修人 .....	(101)
潘漠华 .....	(160)
冯雪峰 .....	(236)
谢旦如 .....	(262)
后记 .....	(268)

## 小 引

1922年,3月31日,中午。杭州城站。

上海开来的列车缓缓进站。车刚停稳,一个一手提着挈篋,一手拿着礼帽的青年男子就跳下火车,四处张望;一个身材矮小、满脸稚气的青年手里拿着照片,逆着人流,挤向四下张望的青年。刚下车的是上海棉业银行职员应修人,来接站的是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汪静之。二人都是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他们已通过十多封信,却没有见过面。当应修人决定来杭州会见诗友并作春游时,就去拍了一帧一手提挈篋一手拿礼帽的照片寄给汪静之,以便他接站时能“按图索骥”,不致认错了人。这两个青年的会见在进出车站的人流中是引不起谁的注意的,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社——湖畔诗社却将由此产生。

70多年后,当满头银发的汪静之老人在他的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对笔者追述这段遥远的往事时,他仍清楚地记得这次标志着青春时代的辉煌的会见,以及其后诗友们交往中的种种细节。走出车站,汪静之把应修人领到湖滨的清华旅馆下榻;下午,汪静之陪着应修人游了孤山和西泠印社。应修人提出第二天游湖请几个“要好而又诗写得好的”朋友一起去。商量的结果是,次日

游湖由汪静之约晨光社社友、“一师”的同班同学潘漠华和低一级的冯雪峰同去——当时游湖的小划子只有四个座位，人多了坐不下，人少了坐不稳——湖畔诗人的人数就这样由小游船的座位数决定了。4月1日晨，汪静之陪应修人到“一师”与潘漠华、冯雪峰晤面；当天，四个青年诗人就绕西湖游了一周。“一师”当年正在推行的“减少授课，增加自习”的做法给青年诗人们以很大的方便：这四位年轻人尔后一星期徜徉在湖光山色间，沉浸在友情的温馨中，让西湖的美景为自己“授课”，同时也“自习”着各自内心中涌动着的情感——这样全身心地融入诗中，在人的一生里是只有青春时期才可能有的。四人中最年长的修人初到杭州，就以新鲜的感觉，准确地把握了西湖的特点：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的掩映里，  
我认识西湖了！

他们带着各自的诗稿游湖，交换轮阅。4月5日，四个人没有去游西湖，修人把漠华、雪峰和自己的诗编为一集，题名《湖畔》。<sup>①</sup>“因为要出版《湖畔》，他又倡议成立一个湖畔诗社，大家一致同意。他又想到刚编成的《湖畔》诗集只选了三人的诗，湖畔诗社四个诗友不可缺一个，因而他又从《蕙的风》（汪静之已将这本诗集交上海亚东图书馆，该馆已准备出版）的底稿里抄出六首小诗加

<sup>①</sup> 经与上海鲁迅博物馆藏的《应修人日记·1922》核对，汪静之晚年的回忆中所说的日期略有出入，现据改。

进《湖畔》，作为一种象征，表明湖畔诗社有四个诗友。”<sup>①</sup>一周的湖上畅游，歌笑歌哭，缔成了四个青年诗人的毕生友谊。4月6日，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到城站送别了修人。他们原拟《湖畔》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并将已交稿的《蕙的风》作为《湖畔诗集》之一；但交涉没有成功，最后《湖畔》由修人斥资195元银洋自费印刷出版。

人往往是无意间进入历史的。几个青年人的一本薄薄的诗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自己当初是不会想到的；时过境迁，今天的读者或许更难想象到。这里不妨举两个事实以见这本诗集影响之一斑；后来成了现代中国的伟人，又被认为是不读新诗的毛泽东就曾读过《湖畔》，很久以后还向胡乔木说过，《湖畔》是很好的诗；<sup>②</sup>他甚至“曾从广州托熟人捎口信给他（冯雪峰），说自己很喜欢他写的新诗，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sup>③</sup>。而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的胡风，回忆起《湖畔》对他的影响时说，这本诗集“教给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了的心情”，“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sup>④</sup>对于《湖畔》的作者们，如此好评肯定是不

① 汪静之《修人致漠华、雪峰、静之书简注释》，《修人集》第239页，楼适夷、赵兴茂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② 胡乔木《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

③ 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第12页。又，陈早春等著《冯雪峰评传》第20页：“毛泽东还托人带话给他，说他的诗写得非常好，并希望他能到南方去，以便一起参加大革命工作（这一情况，冯雪峰生前曾向笔者说过）。”两条材料同一意思而分别出自冯雪峰的儿子和同事之笔，应该是可信的。

④ 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第261页，生活书店1934年版。

虞之誉。……汪静之老人谈到这些往事，眉宇间充满了深深的怀旧与难以言说的沧桑之感。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70多年后已沉积进深深的历史地层，当年歌笑歌哭在湖畔的修人、漠华、雪峰各以浓墨重彩写下了壮丽与辉煌，而历史也确证了他们都是大写的人。近30年，老人生活在当年留下过无数记忆的杭州，如今已是幡然一老。散文家袁鹰为老人写过一篇《天留一老伴湖山》，但老人已不可能常去西湖边追寻那恍如隔世的青春岁月了……

修人，是诗社的长者，比我大两岁，却喜欢称我作“小哥哥”，后来又改称我“静妹”。他第一次来杭州，我陪他住在清华旅馆，两人并肩而睡，他说这是“尝新的第一夜”。他入党后介绍我看《共产党宣言》等革命著作。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时我和他都在武汉，还是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我见过他的妻子桃仙姑娘，后来还怪过他丢下了桃仙和父母去冒生命危险……1933年5月，他去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丁玲住处联系工作，在与埋伏着的国民党特务的搏斗中坠楼牺牲，只有33岁。

漠华，外表持重斯文，内心却极激烈。他与我同学时间最长。他跟我说过，改名漠华，是因为中国像沙漠，他要在沙漠中开花。他告诉我他初恋的对象是他的堂姐，爱得死去活来，我为他保守了60多年的秘密。1934年底，他在国民党狱中领导绝食斗争，受尽酷刑，最后被灌了滚烫的开水，牺牲时年仅32岁。我还怪过他：在这种情形下，何不保存自己呢。

雪峰算是活到70多岁，最后生癌而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做过我的领导。真是个耿直血性的好人哪。他不是

当官的人。1923年“一师”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雪峰也中了毒。修人心急火燎地从上海赶来，看到雪峰没事，高兴得不得了。那夜修人、漠华和我三人共被睡在他病床边，短短一夜令人毕生难忘。这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担任过重要职务又蒙受过极大屈辱的共产党员，在大夜弥天的严寒天含恨死了，死了还有人说他坏话……

谈到自己，老人说自己青年时代就想在西湖做隐士——说这话时，看不出老人是在自我批判还是带点骄傲——虽然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既不能为修人、漠华收尸殓埋，抚棺恸哭，又不能与相处时间最长的雪峰临终一诀，尽相濡以沫之义，不能不说留下了终生之憾。当年徜徉于西子湖畔时，谁曾想见过彼此将以何种方式走完人生道路？此刻，老人的年纪几乎已等于修人、漠华他们全生命的三倍。余年无多，他有生之年最想完成的是哪些事？1985年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老人为建立湖畔诗社纪念馆奔走呼吁，征得了叶圣陶、宗白华、冰心、沈从文、巴金、臧克家、冯至、艾青、艾芜等20多位著名作家签名支持。尔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纪委主任陈云分别为湖畔诗社纪念馆题写了匾额，西湖上终于有了湖畔诗社纪念馆。老人还想办湖畔诗歌函授学院，想出刊物和丛书，以推进新诗的创作和研究，想让他任社长的新湖畔诗社为我国文学事业做更多的贡献。但办成的事远没有想办的多……说到这里老人表情不多的脸上又显示出一种天真的无奈。

与建国后17年中只出过《蕙的风》、《应修人 潘漠华选集》二书相比，进入新时期以来，湖畔诗人应该说是颇不寂寞的。雪峰的错划右派问题改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搜集了他的主要著

作,出版了四卷本的《雪峰文集》;研究与纪念雪峰的文章最多,仅《冯雪峰评传》就至少出过两本。<sup>①</sup>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浙江烈士文丛》出了《修人集》与《漠华集》,近年又出了《修人漠华诗全编》,收入《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书系》。80年代前期,上海书店按原书版式、开本影印了《湖畔》与《春的歌集》。几乎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按原本合印了这两本诗集。汪静之老人的书,除上海书店按1922年初版影印了《蕙的风》外,以《蕙的风》题名,合《蕙的风》与《寂寞的国》为一,经老人修改删定的选本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漓江出版社(1992)出版,最近又被作为《中国新诗经典》之一,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湖畔诗社作品选》和《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新文学论丛》、《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发表过研究湖畔诗人的论文;各种新出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湖畔诗人以颇高的评价。然而,至今还没有以今天的眼光研究湖畔诗社的专著。当笔者向汪静之老人表示要写一本研究湖畔诗社的专著时,老人露出了欣逢知音的笑容;从他天真的笑容里,笔者仿佛又看到了70多年前那个坦诚率真、不善遮掩的少年诗人。

从1986年春夏之交写“五四”诗坛上的蕙兰——论汪静之的早期爱情诗<sup>②</sup>时起,笔者一直与老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先后作过十几次长谈。1996年7月10日,在盛暑郁热的雨声中,老人与笔者侃侃而谈,历二小时而无倦意,还约定秋凉后再作深

① 《冯雪峰评传》至少有陈早春、万家骥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和吴长华著,上海书店1995年6月版两种。

② 拙作,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1987年第1期。



谈。没有想到这是与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才知道，老人7月16日发病住院，终于在10月10日与世长辞。95岁应称上寿，但我收到老人治丧小组寄来的讣告时，仍为之郁郁者终日。本拟秋凉后为他拍一些照片留作纪念，于今徒成虚愿了。10月22日，我专程赴杭参加了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肃穆的灵堂里，在哀乐中，我脑海里又浮现出近十年来已经熟悉了的老人的率真的表情，偶尔也闪过他的带点顽皮的笑容。

对雨伤怀，小别才三月，不意竟成终古恨；  
临风忆往，相知逾十年，无缘再续敞胸谈。

这副挽联只能表达我个人对汪静之老人的一点哀思与敬意。在老人足音永绝之时，我突然觉着一种历史的庄严感；随着这位硕果仅存的湖畔诗人的去世，湖畔诗社最终地进入了历史。作为后学，我能做的事恐怕只有尽快地完成曾经使老人闻之现出欣慰的笑容的这本《论湖畔诗社》了。

今年是四诗人湖畔结社的75周年。笔者谨掬一瓣心香，奉上这本小书，以纪念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深足印的湖畔诗人，并以此悼念视我为忘年之交的汪静之老人。在精神性的财富还得不到社会足够重视的今天，写这本小书自然不抱什么奢望。这本小书也不可能是什么“名山事业”。我所希冀的是，它能在以今天的眼光解释历史的过程中，给湖畔诗人以文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定位。所论如果近理，或许可为撰写现代诗史的学者提供哪怕是相当微末的帮助；所论如果浅薄，希望有识之士能匡我不逮；所论如果谬误，我是愿它虽被敲碎却还能做铺路的石子的。

1997年元月